

“历史与时间：欧洲与中国之比较研究”

——第十五届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综述

汪 炆

2019年9月2日至6日,第十五届中法瑞历史文化研讨班在华东师范大学隆重开班。本次研讨班由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协办。来自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EHESS)、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巴黎高师、格勒诺布尔大学、弗里堡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者为学员授课。研讨班的关注点由此前的空间、记忆等话题转向时间,主题为“历史与时间:欧洲与中国之比较研究”。

开幕式上,华东师范大学世界历史研究院执行院长沐涛教授在致辞中指出,比较方法对中国与欧洲研究、历史与时间这一课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研讨班以主题报告与工作坊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后为中法两方学者共同参与的研讨会,以充分体现中西比较与文化“桥梁”的特性。^①

一 历史时间观的文化比较

关于历史与时间的比较研究,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埃蒂安·布尔东(Étienne Bourdon)教授题为“思考中法之间的历史时间观”的主旨演

讲,为其体现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意义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引。他认为,历史学家由于同时间本身的“纠缠”,反倒存在忽略时间研究的情况,只有布罗代尔、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历史学家有过相关探讨。而哲学家自亚里士多德以降,经奥古斯丁、笛卡尔、斯宾诺莎、孔德等人,直至柏格森、海德格尔为代表的现象学传统皆对时间问题给予关注,当然也不可忽视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在此方面所做的工作。

不过就哲学家而言,更多是将时间这一观念从历史语境中抽离,作纯粹思辨性的考量。而人类学家与语言学家则过于关注结构性的因素,先验性地预设了时间观念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结构一致性,使其要么与现实情况脱离,要么陷入结构主义的假象。在此,布尔东教授以布罗代尔与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论战为切入点,提出“时间即文化”的观点,认为时间观本身就是一

^① 本次研讨班由巴黎三大高等翻译学院(ES-IT)的韦邀宇、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的吴蕙仪以及华东师范大学的肖琦三位老师担任翻译,也体现了研讨班在中西历史与文化交流上发挥的“桥梁”作用。

种文化体系,作为文化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发明而非发现。

布尔东教授还回顾了时间观念的形成过程,以此体现我们当下所持时间观念本身的层累性与复杂性。在时间标定体系维度,公元725年,比德(Bede Venerabilis)将耶稣诞生作为基准点,才将不同事件纳入普遍编年体系,之后随着教会记录、档案编纂和司法文件的签署,在编年史与普世史的历史写作中推广。在物理学维度,可上溯至亚里士多德在时间与运动之间建立联系,伽利略在实验意义上就自由落体运动引入时间参数,最后是牛顿将此理论化、形成一线性均质的绝对性时间,当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对此的一个反拨。实际上,除了以上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物理学家所思考的时间,还有不同心理、社会与历史意识中错综复杂的时间观,如金兹堡(Carlo Ginzburg)《奶酪与蛆虫》中磨坊主、科尔班(Alain Cobin)笔下旺代地区木鞋匠的时间即为例证,时间是各种时间观下的嵌套与融合。

布尔东教授指出,在方法论层面,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果,同时跨文化比较与交流的体察需要认识东方主义的问题,并且这样的探索不能仅仅停留于概念游戏,而是要深入不同历史维度、社会维度做更为细致的实践研究,如此才能真正建立起在时间维度中理解不同他者文化之间的桥梁。在相应的讨论环节,华东师范大学朱明副教授与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就时间观念构建与语言游戏、现象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进行了阐述。

就历史时间观的比较研究而言,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的罗伯特·弗兰克

(Robert Frank)教授从“历史的周期循环”入手进行分析。他指出,如果历史学家缺乏像布尔东教授提到的跨学科取向,则会将历史的循环现象进行简化论的解释,遮蔽了历史本身存在的复杂向度,因而其以循环为切入、用四个具体例证来做详细探讨。

首先是有关中国历史书写中常见的治乱循环,实际上除政治版图的统一与分裂外,尚有经济、文化等演变线索。由此也转入第二个循环的讨论,即经济史中常见的经济循环理论,如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f)经济周期,但这样的体察如果落实到历史中考量也有诸多不符之处,因为这样的理论毕竟存在简化和剪裁的因素。

其次,有关社会思潮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循环探讨,弗兰克教授将其与当前国际环境相关联。就社会思潮的循环来看,似乎同以上讨论的政治、经济循环相关联,但思潮本身相较实际情况或有超前、或有滞后,不能简单化约。他结合贸易摩擦以及逆全球化的现状探讨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张力。

最后,有关循环的讨论落实到更为实际的欧洲建设历史上,弗兰克教授结合政治、经济和心态的考察,回顾了欧洲一体化的思想基础以及相应的进程与反复,对当下英国脱欧问题也进行了反思。他指出,循环不过是后世对此前历史的一种构建行为,通过对兴衰这样的危机阐释来论述自身新的发展方向,故而危机也可视为人的一种觉醒,从而向新的目标展开探索。

二 时间观念的流行

基于上述方法论的探讨,此后的报告依照

时间脉络对时间观念的流行做了更为细致的体察。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米海伊·科比埃尔(Mireille Corbier)教授追述了“罗马时代的时间观念及其表征”;巴黎第一大学—先贤祠—索邦大学弗兰克·雷斯特林冈(Frank Lestringant)教授从杜·布尔达斯(Du Bartas)的诗歌《创世记》中体悟神学思想下的时间观念,此为时间观念“流”的层面;格勒诺布尔大学萨米亚·乌努奇(Samia Ounoughi)教授分析了19世纪英国旅人对中国时间观的体悟;弗里堡大学皮埃尔-伊夫·东泽(Pierre-Yves Donze)教授透过钟表业的发展来勾勒时间观念传播的状况,此为时间观念“衍”的层面。

科比埃尔教授首先从法语中“时间”(temps)一词入手进行词源学上的探析。“temps”来自拉丁语,保留其中“time”和“weather”两个维度的意涵,并且法语中有关年、月、小时、世纪等词同样由拉丁语演变而来。当然,也有少部分,如作为“temps”对应的“chronologie”则取自希腊语。

关于罗马时间的探讨,则从日期的确定与度量、相应的命名与庆典、背后潜藏的观念因素等方面展开。日期方面的论述是对布尔东教授有关时间体系说明的补充,以太阳历为基础的儒略历的确定同样是一种将时间结构化的体现。当然,在这样结构性的时间之上,必定就有相应采用的命名与庆典体系,名年执政官与罗马建城年份是基督教引入前罗马重要的命年体系,同时由庆典也能体悟到时间背后的政治与宗教因素。

雷斯特林冈教授则以杜·巴尔达斯个案研究为切入口,叙述了16世纪这样的转型时期存

在的由创世到末日审判的封闭时间观与世界地理拓展的开放时间观。但两种时间观念并不冲突,而实际上是一种融贯的思想。透过未完结的诗歌,通过隐喻的方式展现开放的地理空间所打开的开放时间观念,末日审判的终点则是对开放之后向永恒与和谐的回归。当然,杜·巴尔达斯也不仅仅是个案,他的诗歌广泛传播,并得到后世作家的续写。弥尔顿的《失乐园》就是其中代表,体现了时间观念在当时的普遍存在。

在“流”的层面,乌努奇教授透过19世纪来华的英国旅人对中国时间观念的描述来呈现两种时间观的相遇。旅人所注意到的天干地支、皇帝庆典、历史戏剧,皆使其意识到两种文化下时间观的差异性。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因此陷入类似东方主义的窠臼,在游记记载中还是明确两种文化间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不过是不同的取向。作为两种文化之间的桥梁特性,语言在其中发挥的媒介作用不可忽略,马礼逊对中国语法的研究就是一个例证,但他试图用西方语言中的时态来框定中国语法,这也体现出跨文化之间存在的一种预设。对此,乌努奇教授指出,我们当下同历史上的旅人之间同样是以语言这个媒介来摆渡,故依然要对此保持警惕,避免将历史情境简化。

东泽教授通过钟表的物质史来对时间观念的传播与互动做一更为具象化的呈现。钟表在明末清初就已通过传教士传入,但当时主要是作为宫廷奢侈品,并依照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做出调适。由于瑞士本身的地理特性,19世纪以降对中国的钟表输出更多需要依赖英国、香港地区作为中介。而随着钟表的输入与进入平

民阶层,折射出西方时间观念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开始渗入中国人的时间观念。1949年后,国营钟表企业的发展使得瑞士钟表的输入从大宗贸易转向受限的小企业,但现代时间观念无疑已在中国扎根。故在改革开放后,瑞士钟表又在中国找到了市场;时间观念的演变亦可作为考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窗口。

三 “复数长时段”视阈下的历时性研究

当然历史研究与时间的关联也不仅仅是将时间作为研究对象,同样也体现在将时间作为历史思考的一个向度,巴黎高师克里斯多夫·夏尔勒(Christophe Charle)教授就是通过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梳理来进行历时性的研究。^①

夏尔勒教授首先从“进步”“现代”和“现代性”三个概念自1800年以来的词频统计入手,发现“进步”与“现代”概念自1800年以来成为主流,而“现代性”则较为少见,但从1980年开始,“进步”的词频为“现代”所超越,同时“现代性”的词频也有大幅增加。在此通观性认识的基础上,夏尔勒教授通过概念史的路径呈现“现代性”的历时性演变。

“现代”一词最早出现于古典末期的5世纪,指刚刚过去的、现在或是即将到来的时间。11、12世纪期间,出现对应的形容词,作为“新”的近义词。17世纪的古今之争与此后的科学革命,使其在戏剧、文学和科学方面发生转变,认为并非古典的原则而是现实的受众认可才是评判优劣的标准,故而永恒从由古人标定转向面向未来,法国大革命则加深了这一断裂。虽然有法国复辟王朝的反复,但毕竟已显现新的样态,最终由七月革命开启了1830—1850年的第

一波“现代性”。在波德莱尔的诗篇中,“现代性”有了更为明确的体现。因此,夏尔勒认为,1850年至1890年期间为“经典现代性”时期。在此期间,“现代性”也通过欧洲的殖民扩张以及国民教育扩展到世界各地以及各个阶层,使得第一波“现代性”时期呈现复数的“现代性”逐渐同一化。不过,由于“现代性”指引的未来向度与所处现状的错位,使得19世纪末出现批判“现代性”的浪潮,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现代性”的未来幻想破灭。

除了对“现代性”简史的追溯,夏尔勒教授同样关注当前的现实问题。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几波所谓“现代性”的浪潮,体现出对历史的终结以及对未来的想象,但这其实早在19世纪孔多塞等人的思想中就有体现。另一方面,夏尔勒教授更多的是从欧洲出发对现代性进行追溯,而亚洲和拉丁美洲需要不同的视角,同时英国脱欧也使得这样的问题需要重新体察。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夏尔勒教授的“现代性”简史也可视为在长时段中对“现代性”这一概念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而言,长时段也并非显现为单一性,实际上是“复数长时段”的并置,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不同阶层、不同领域皆有差异,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莫里斯·埃玛尔(Maurice Aymard)教授就是在这一视阈下入手考察的。

埃玛尔教授首先回顾了长时段这一概念工

^① 夏尔勒教授因为行程安排原因并未出席,不过提供讲稿由其学生华东师范大学的肖琦老师代读。Christophe Charle, *Discordance des temps. Brève histoire de la modernité*, Paris, Armand Colin, 2011.

具的来源,在布罗代尔1968年明确提出这一概念之前,20世纪初的植物学家、历史学家已经对此有所关注。布罗代尔也是在《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的篇章布局和书写过程中逐渐意会的。作为布罗代尔的学生,埃玛尔教授补充了布罗代尔在战俘营中的书写经历,表示长时段视角的引入与布罗代尔面对德军入侵的情境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因为从更为宽广的视角来看,这样的占领和失败也不过是一暂时性的过程。

基于对长时段概念的说明,埃玛尔教授指出,这一概念工具同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结,以及其他学科对“长时段”的采用,使其充分体现出跨学科的意义。与此同时,长时段与事件也是宏观与微观之间体察的窗口,以长时段视阈对各种体系、传统、文明等之间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可看到凝固时间下的“复数长时段”。之后的讨论环节,也注意到长时段因素的考察,不仅仅局限于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像波罗的海、黑海、中日韩之间海域皆为广义上的地中海(the middle sea),皆可以此角度进行分析,从而

印证了空间维度的“复数长时段”。

研讨班结束后,关于时间这一问题的研讨会继续召开。复旦大学邓志峰教授通过对结绳记事以及《易经》象数观念的论述,展现了中国传统德性思维下的时间观念,并与西方知性思维下的时间观念作了比照。科尔比埃、范丁梁、布尔东和雷斯特林冈教授分别从生日庆典、宗教文本、宇宙志书写、文学作品等角度透视时间观,充实了从古罗马到近代时间观念流行的说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韩琦教授则探析了康熙时期法国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瞿骏、陈慧本、张旭鹏教授则分别从历史分期、史学史、时间政治角度出发来探讨时间。由于时间这一话题尚留有大量探讨空间,同时作为体现文化比较与互动的窗口,对当前中国、欧洲与世界问题研究都有所启示。李宏图教授表示,下一届研讨班将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希望能给予学界更多启迪。

(责任编辑:齐天骄)